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之三

儒學的現代反思

蕭振邦／主編 何秀煌／等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之三

儒學的現代反思

蕭振邦／主編 何秀煌／等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儒學的現代反思 / 何秀煌等著 ; 蕭振邦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6
面 ; 公分. -- (鵝湖學術叢刊 ; 31)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 3)
ISBN 957-668-489-7(精裝). -- ISBN 957-668-490-0(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現代(1900-) - 論文, 講詞等

128.07

86015375

③1 刊 叢 術 學 湖 鵝

儒學的現代反思

主 編 者：蕭 振 邦
著 者：何 秀 煌 等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號

電話：二三六三五〇〇八・二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五八二〇號

定價：精裝新台幣二九〇元
平裝新台幣二一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57-668-489-7 (精) 957-668-490-0 (平)

作者簡介

蕭振邦 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何秀煌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李瑞全 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安樂哲 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林安梧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教授

黃慧英 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學部教授

江日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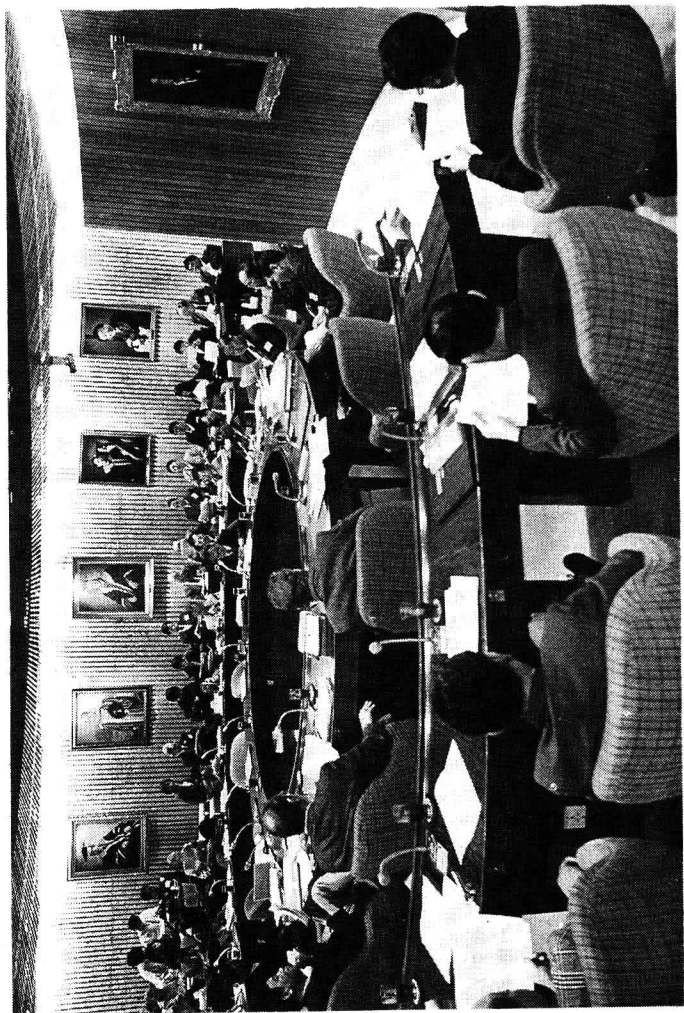
周博裕 中國文化大學講師

貝斯朗 (John Berthrong) 美國波士頓大學
漢學教授

艾 愷 (Guy Alitto)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
學系教授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外景
——香港中文大學1996.12.28-30 圖：周博裕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會場一一景
——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1996.12.28-30 圖：周博裕

《儒學的現代反思》

目 次

- | | | |
|-----|---------------------|--|
| 1 | 李瑞全 | 總導言：當代新儒學的危機與開展 |
| 7 | 蕭振邦 | 《儒學的現代反思》導言 |
| 13 | 何秀煌 | 傳統哲學研究的方法論難題
——論中國哲學研究的「語言」 |
| 27 | 李瑞全 | 當代新儒學之後現代理論 |
| 41 | 安樂哲 (Roger T. Ames) | 著·張燕華 譯
中國式的超越，抑或龜龜相馱以至無窮 |
| 67 | 林安梧 | 「順服的倫理」、「根源的倫理」與「公民
的倫理」——對儒家道德倫理概念的反省與考察 |
| 87 | 羅秉祥 | 儒家內聖之學新建構芻議 |
| 103 | 黃慧英 | 價值與欲望——孟子大體與小體的現代詮釋 |
| 121 | 江日新 | 政治及文化中「人格團結」與當代儒者的身
份認同——一個哲學人類學的嘗試 |

- 139 | 周博裕 康德「純粹實踐理性底方法學」對新儒學之
啓發
- 175 | 貝斯朗 (John Berthrong) 著・王忠欣 譯
傳播儒道：波士頓儒學一瞥
- 211 | 艾 愷 (Guy Alitto) A Reassessment of
Liang Shuming's Prediction of
the Imminent Confucianization
of Western (Societies)

當代新儒學的危機與開展

總 導 言

李 瑞 全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底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是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鵝湖月刊社、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由於場地與工作人力所限，是次會議不得不限制邀約學者之人數，本地亦限於以學者參與為主，其中也有自費從遠地來參加的研究者。大會共發表了約六十篇論文，基本上經作者訂正及評審後，主要收集成爲此套四冊的論文集。有些論文或因體裁不合、或因內容不符大會主題、或因未曾成篇，也有因已另行刊登、等等因素，而未收錄在這套論文集內，如有可能或將另行刊登，以饗讀者。

是次會議第一次離開發源地的台北，也是第一次回到與當代新儒學之興起和發展極有關係的香港舉行。由於歷史因緣，香港與當代新儒學及海外儒學的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除了早期有錢穆與唐君毅兩位先生參與創辦新亞書院之外，中期又有牟宗三及徐復觀兩位先生來港，後期更有劉述先和諸位先生之早晚期學生在香港從事新儒學之研究與講學。除

了長期在香港居留教學外，唐、牟、徐三位先生的許多重要和晚期著作，都是在香港完成出版的。新亞書院、新亞哲學系和新亞研究所更是當代新儒學諸大家所曾長駐講學之地。因此，回到香港舉辦當代新儒學的國際會議，不但是追源溯始，瞻仰前輩行蹟之所，也有表揚諸前輩老師在海外國際宏揚儒學之鉅大貢獻之意。

是次會議舉辦時，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的大師只牟宗三先生尚存。大會敦請先生及劉述先教授為主題講者，然先生養病台北，未能蒞會，與會者均感錯失親聆先生講學論學之緣。而先生病情日轉沉重，不幸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痛逝於台北，長為師友後學所哀念，也為第三期儒學的第二代寫上句號。有謂此標誌「後牟宗三時代」已來臨，顯示牟先生在第三代儒學的繼承與開新上所具有的泰山巖巖的地位。此後，當代新儒學再往前開拓的工作，實為唐、徐、牟諸位先生之門人所必須肩負的學術責任。

一、第三期儒學的學脈

第三期儒學乃相對先秦及宋明儒學而言，代表學者主要是熊十力先生及其嫡傳的唐、徐、牟三位先生。大陸上以「現代儒學」一名泛指熊先生及其弟子和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以致賀麟、方東美等，既無簡別，亦且暗含貶意，即以儒學為已屬過去時代之產物，並非當前尚在生長發展或在當代社會仍具有真實意義與影響力的學術流派，其所意謂當代的學術思想只有馬列主義。「當代新儒學」一名乃針對此意而立，以表明第三期儒學並非已過去了的思想，而是在當前仍在生長發展和在海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潮，也是中國當

代最有活力的一個思潮。此名也同時為判別旅居港台的唐徐牟三位先生及其後繼者不同於一般研究中國哲學以至儒學，而缺乏真正「新」的學術意義的儒家或儒學研究者。

當代新儒學一名不但標示一位哲學工作者乃歸宗於儒學，即繼承孔孟及宋明儒學之以仁心善性、上通天道、下開人文為其思想核心，而且以此基本義理回應西方文化之挑戰，完成儒學之現代化。敵視儒學的西化派和馬列主義固然不是當代新儒學，張之洞那種「中體西用」理論也不是當代新儒學。正如孔孟之後，中間約千年的儒學都不得謂為新儒學，必宋明儒之回應佛老之學術挑戰，方可謂之為新儒學。同理，第三期儒學亦必有其所對應的時代課題，方可冠以此名。在宋明儒學，周濂溪以誠貫通《易》、《庸》而振興儒學，乃有後繼之橫渠二程，確立第二期儒學。前此之儒者，及宋明以後之儒士，均不足以謂新儒家之學。熊十力先生從佛家重返儒門，乃真是第三期儒學之創立。雖然熊先生只確立乾元性海、道德本心之當體呈現，卻真乃儒家之本色，此不可誣；而熊先生之提出建構儒家之量論，以吸收消化西學，正是第三期儒學之基本課題。

第三期儒學的主要工作可分兩方面：一是重新闡釋儒學的基本義理，一是吸收消融西方哲學與文化思想。這兩部份的工作都非常艱鉅，也密不可分。第一部分的工作不但要對儒學有精切的掌握，而且能運用現代、尤其是西方哲學與語言概念來闡述與重建。此中所要求於當代新儒家的不只是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體會理解而已，而且已對西方哲學有深入的掌握，否則無以為儒學作出對現代世界有意義的論述，和真正作出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當代儒學的重建。此即顯示第一部份的工作已無可避免涉及第二部份的問題。第二部的工

作更可說浩如煙海的探索，因為，西方自有其源遠流長、博大深厚的學術與文化傳統，著手已不容易，而是否成功更不可期。要完成這一部份的工作，不但要對西方哲學要有真正深入而中肯的理解與掌握，而且所用以重建儒學的哲學思想尤應對題，即能對儒學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恰當相應的。而要真能完成這兩部份工作，使所成就的當代新儒學真為對題的有意義的建構，更需要對中西文化的發展與特色有一審識，深明中西文化之何去何從，而這更是不容易祈求的。

唐、徐、牟三位先生無疑對儒學的基本義理有精切的理解，對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的重整與疏釋有重要貢獻，而且都能對西方思想，尤其是與西方現代化相關的思想概念，有精到的了解和運用。徐先生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唐牟二位先生則分別運用黑格爾和康德的架構，吸收西方哲學，包括形上學與知識論，建構出當代新儒學的宏大體系。當然，三位先生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之體會與力行，對中西文化的洞見，都是世所罕見的。由於三位先生的一生努力，當代新儒學才有真正足以與西方任何大哲學家或思想互相比美的學術成就，和進而批判西方文化的思想理念。

二、時代的終結與危機

牟先生的離開，不但標誌了第三期儒學的第二代之過去，也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第一、二代的當代新儒者都先後經歷了清末之腐敗與屈辱，民國之軍閥混戰，八年抗日，國共內戰，以致大陸赤化，終身或多或少都在戰亂流離之中。然而，這些先輩並未放棄一生的志業，鏗而不捨以竟全功；更由於與時代共同奮鬥，共歷艱辛，使他們更能深切於中國

的時代課題，於中國走上現代化有更對題的反省與成就。反觀第三代以下的學人，一般都是在港台海外較穩定舒泰的環境下成長與工作，缺乏一種迫切感、危機感、呼召感，沒有一種「一生為理性而奮鬥」的責任與毅力。

我們似乎較諸先輩有更佳的條件與資源以理解西方以致中國的文化與哲學。但是，一方面由於我們或多或少在較西式的教育下成長，對中國傳統的學習和理解的基礎都不免薄弱了許多。另一方面，更由於接受較多西方二次大戰後的思潮和生活方式的熏陶，而習染不少牟先生常批評的西方現代思想的病癥：「無體、無理、無力」。而在這樣一種風習之中，不能沈潛心性，對西方哲學與文化的理解也無從說起，更不要說對中國古典有青出於藍的貢獻了。若只襲取幾個新穎名詞，即使有一點理解，也不足以擔當這一承先啓後，為往聖繼絕學的重任。遑論所謂「超越牟宗三」之開始了。

當代新儒學之消化西學，實現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化，雖然在諸位先生的努力之下，已有豐碩的成果，但是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止於此。一方面當然是還有極多工作有待後人去完成。另一方面，更為棘手的是：西方文化也在不斷演化之中，並沒有在現代化走了三百年之後停頓下來。西方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即深切反省到現代化的一些不足和流弊。因此，西方不但在哲學上仍不斷湧現新的思潮，而且對現代化也有批判的反省，由此而形成所謂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社會的出現。後現代之宣稱主體之死亡，與乎反對鉅構式的合法性講述，似乎在在均與當代新儒學之取向相違。

當代新儒學本是回應西方現代化後的社會政治思想的發展而出現的，目標自然是藉以現代化中國的哲學與文化，但同時也為天下人尋求在現代社會的出路或安身立命之所。西

方之不能停於現代化而思有以向前進，中國哲學自然也不可能止步不前。事實上，當代新儒學之現代化並不是對西方現代化之下的一切照單全收，而實已包含一吸收轉化西學的意向和工作在內。因此，西方之走向後現代化，並不與當代新儒學相悖，毋寧說這正是當代新儒學所可以有貢獻於西方和世界文化之處。當代新儒學進一步處理後現代化的演化並不表示方向的改變，而只是把內含的一個課題更明確地帶出來。諸前輩先生未能措手於後現代化的課題，固然使我們有無所指引借助之感，但此亦是考驗第三代新儒者的工作。

事實上，自第一、第二代當代新儒學者的努力之後，我們對中國哲學與文化不但有長足的進步，遠非西方學術界所及。而經近一個半世紀的學習西方，西化或現代化努力，我們對西方文化與哲學也比西方對我們理解更高。在反省及比較中西文化，尤其是未來走向上，我們常更具學術基礎，而少西方學界常有的無根的自大。西方自十九世紀以後常帶有的文化霸權心態，常使他們不能借鑑東方及中國文化的優點，以糾正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流弊和偏差。反之，當代新儒學自始即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中國及西方的哲學與文化，尋求乎人性人情的社會政治文化的出路，而此一取向，不但對中國之要現代化，對西方所面臨後現代化，以致人類文化所可能遇到文化困境，都可說是相應的。第二代的當代新儒者實已奠下堅實的基礎，足供我們取用佈施，以應面臨的挑戰。

大師仙逝，一剎間山河頓默，天地失色，但危機亦是轉機，此當是同仁們所應夕惕以赴，奮起以繼薪傳之際，庶不失先師之教誨，亦所以慰先輩在天之靈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

《儒學的現代反思》

導言

蕭振邦

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與台灣鵝湖雜誌社共同舉辦。會議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會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共發表論文六十篇，這些論文於會後由大會編委會分冊編輯出版——本論文集分冊共收論文十篇，主題圍繞新儒學呼應當代問題的討論。大體上說，其中有三篇探討方法學問題，四篇針對倫理學課題發抒，三篇以人之特質入手而闡述儒學思想的諸面相。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何秀煌教授〈傳統哲學研究的方法論難題：論中國哲學研究的「語言」〉一文，由「『傳統哲學』從既定的「哲學傳統」塑造、轉化」的前提出發，而提問：我們應如何研究、闡釋與應用傳統哲學思想？何文指出，為避免流於「以經解經」的同語反覆境況，我們必須擁有一套闡釋用的後設語言暨後設語言的後設語言。何文即以「研究中國哲學的語言」為核心，說明其意義與目的。至於何文所提出的「記號人性論」、「大、小語言」等新穎看法，可供吾人進一步探究。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瑞全副教授〈當代新儒學之後現

代理論〉一文，先預設了西方文化是當前世界的主流，進而提問「代表現代化或理性化的西方文化自身出現了困境時」，如何由此現代化的困境邁向後現代化之境？並提問，是否可以儒學為核心，在反思儒學現代化之同時，找出一種根基，以作為化解現代化流弊的哲學資源，而供後現代化開展？由這些問題出發，李文分析了「後現代理論的特質」，並檢討其核心理念「如何尋求個體的解放」，以及其主要議題「個體性與主體性」、「個人、家庭、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安排與重建」。李文最後提出了一種含融現代與後現代的「雙碼論」，試圖把個體的疏離性與主體性的宰制「調適於當前個體生活之中，使個體既可免除普遍理性的壓抑，又得以建立人間內在親和的關係」。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安樂哲（Roger T. Ames）教授〈中國式的超越，抑或龜龜相馱以至無窮〉一文指出，應將「宗教感」納入儒學的詮釋，而這一種詮釋進路的關鍵就在於「超越性」概念。安文首先闡明西方傳統中「嚴格超越性」的意義，接著說明引用類似概念來詮釋相關的中國古典思想時，經常造成或多或少的傷害。然後，安文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界的精英們卻似乎不願放棄『超越性』，仍把它作為確定中國思想獨特性的恰當的概念範疇。」最末，安文檢討了牟宗三先生有關「天道」的「超越性暨內在性」、「天命」的「創生不已的真機」等看法，而指出其「相當不必要地強化了對中國傳統的那種熟悉的誤解」，以及「鼓勵了新一代的中國學者去努力發掘西方古典思想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共同基礎，這樣一種誇張的認同情結」。安文的後半段為此一看法提出了說明，並藉用「龜龜相馱」的譬喻作結。

南華管理學院哲學研究所林安梧所長〈「順服的倫理」、

「根源的倫理」與「公民的倫理」：對儒家道德倫理概念的反省與考察〉一文，揭露了嘗試對儒學架構作一全面分析的意圖，此意圖以三面相——生活化、批判性暨宰制性——呈現其特質。林文反思了儒學的多元性暨其限制，並且，在針對倫理向度之諸種因素互動所產生的各項問題考察後，嘗試提出釐清之道暨正面的意見。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羅秉祥教授〈儒家內聖之學新建構芻議〉一文，由憂慮儒家內聖之學在當代逐步異化的關懷出發，先釐清現代人對「內聖之學」的錯置，然後把問題的解決導入「應用倫理學」範域，並提出了他所謂的「創造性轉化」等看法。這一種轉化的關鍵在那裡？羅文指出，首先要重新體認「格物致知」的工夫，然後再把一般性的道德規範在日用尋常中體現出來。這些基本進路述明之後，羅文著力於中、西倫理課題暨應用倫理的對照檢討，並凸顯出儒學義理的殊勝處，以及有待進一步發揚的課題。

香港嶺南大學通識教育部黃慧英副教授〈價值與欲望——孟子大體與小體的現代詮釋〉一文，藉由孟子「大體、小體」的倫理區分，闡釋了儒家「自我概念」與「價值判斷」的現代內涵。黃文首先辨明了「第一序暨第二序欲望」的區別，並以法蘭克福（H. Frankfurt）的「意志自由」理念說明了所謂的「第二序欲望」，接下來，黃文即嘗試以孟子的「大體、小體」觀來解決「既然同是『欲望』，人為什麼會認同其『高序意志』以揀選其第一序欲望」的難題。黃文試圖藉著孟子「大體、小體」觀，以說明此一「高序意志」的認同即「人之特質」的彰顯，並指出孟子的看法即針對人的自我概念暨價值判斷之間的關連性所作的點撥。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助理江日新先生〈政治及文化中